

地理研究 第44期 民國95年5月
Journal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 No.44 May, 2006

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節目中環境正義與媒體地方感
之分析：以「斯土安康」影集為例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Media's Sense of Place in the
"Our Island" Program of the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s: A Case
Study of the Film "Is this Place Safe?"**

王景平^a

Jing-Ping Wang

廖學誠^b

Shyue-Cherng Liaw

Abstract

Recently, geographical researches pay much attention to environmental reports increasingly. Because media's emphases on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d land concern in the Our Island Program of the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s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themes of geographical researches, this study selects the 217th film, "Is this place safe?", in this program for an analyzed sampl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how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volved in and how media's sense of place formed in this film for the presentation of land concern. Results show that reporters apply montage and quotation skills of news sources to present theory discourses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For the media's sense of place, this image of Ankeng area is structured by local residents opinion against the establishment of dump landfill there, and that becomes the mainstream discourse in this film and surpasses over other opinions from businessmen and officials. The Ankeng area is formed in this film as a place in harmony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This place image is represented again to the audience through this film. Moreover, the imbalance of access to media for different opinions about the landfill project is also showed obviously in this film.

Keywords: Public Television Services, environmental justice, land concern, media's sense of place

^a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碩士

Master Degree,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b 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副教授，通訊作者

Associate Professor and Corresponding Author, Department of Geography,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E-mail: liaw@cc.ntnu.edu.tw)

摘要

環境新聞報導在近年來引起地理學界的關注，而公共電視「我們的島」節目中所強調的「環境正義」及「土地關懷」更與地理研究主題密切相關。本研究以該節目第 217 集「斯士安康」影集作為分析樣本，企圖瞭解該節目如何彰顯「環境正義」理念於影像文本中，及其如何建構媒體地方感以達成「土地關懷」之目的。研究結果顯示，記者以影像剪輯技巧與引用消息來源之言說，凸顯出「環境正義」的理論脈絡；在媒體地方感方面，當地居民反對設立掩埋場的意見凌駕開發商及政府官員的言論成為影集中的中心論述，安坑圖像也被形塑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地方」，並經由該媒體再現給閱聽人，也再現出掩埋場事件中不同意見在媒體近用權上不均等的權力關係。

關鍵詞：公共電視、環境正義、土地關懷、媒體地方感

緒論

近年來隨著大眾傳播日益普及，新聞媒體對民眾在環境議題的知識層面、論述觀點及政策認知上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無論是報紙、廣播或電視，在環境議題設定上都扮演著重要角色(Bendix and Liebler, 1999)。長期關注環境議題的地理學界，近年來也將觸角延伸至環境新聞的研究，這樣的研究通常將焦點集中於權力的爭議，包括誰被媒體再現出來，而誰又被媒體刻意忽視，其中最讓地理學者感興趣的是誰有這個權力去建構這個議題，以及媒體對這個議題的言說結構是透過什麼樣的方式被置入於更大的意識型態框架之中(McManus, 2000)。另一方面，傳播科技的進步所引起的空間重組，甚至虛擬影像使人們對空間及地方的重新定義，都曾引起傳播及地理學研究者的注意。傳播學者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所宣稱的「媒體即是訊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即明白指出電視傳播具有迅捷及無所不及的特性，他認為因為電視的發達，讓人們進入一個所謂地球村的時代，遠方的議題經由影像進入了我們的客廳，並且連接了地球兩端居民彼此的關懷與責任(Crang, 1998)。Moores(1993)亦曾指出，電視的便利及普及，讓人們可以停留在家中，但卻又同時經由電視去另外的地方(staying home/going places)，此特殊的時空關係，激發學術界發展出電視文化中的人文地理學新領域，尤其關心電視在「認同建構」及「想像社區」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文化地理學者 Crang(1998)也指出，客廳與全球因為電視的連接而產生了媒體地方感的論述，媒體中的流動空間不僅連接了遠方，也造成了文化地理學中地方感的重新定義。

台灣的媒體在解嚴以前對於環境問題的關注甚少，環境不公的情況也常在政府及媒體的聯手操弄下被隱晦不見。邱育慈(2002)就指出，即使在 1990 年代，面對經濟發展與環境保護間的衝突時，部分記者受制於媒體經營者的政治立場，呈現「假環境科學之名，行服務政治立場之實」的偏頗報導，讓讀者無法取得充分的資訊以建立自身對環境問題的價值判斷。許多媒體不僅無法在報導中傳達正確的科學知識及多方意見給讀者，甚至為了避免困擾，在報導中略而不提環境議題爭議背後的政治、法律、族群及勞工等面向癥結。公共電視所製播的「我們的島」一反國內商業媒體對環境議題的漠視，每周以深度報導持續關注台灣環境，成為國內第一個、亦是唯一一個標榜以「環境正義」及「土地關懷」為製作取向的常態性新聞雜誌類節目。「我們的島」較一般主流商業媒體擁有更強烈的環境守護使命，而他們對於公害的揭發與保育的關注更時常引領媒體同業的跟進。

國內關於環境報導的研究大都以量性統計方法比較環境議題之主題與趨勢變化，少數以質性分析手法拆解媒體環境論述之研究，也僅以商業報紙媒體作為分析對象，獨缺電視及公共媒體；國內地理學界亦未見有關於環境報導之質化分析，甚至關於電視影像地方感的討論也付之闕如。為彌補此一空缺，本文嘗試從地理學的角度，透過質化的研究取徑，選擇「我們的島」節目在 2003 年 8 月 11 日播出的第 217 集「斯土安康」影集作為分析樣本，主要探討兩個面向：(1)該節目在報導安坑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議題時，如何呈現他們的觀點，又如何置「環境正義」理念於影像文本脈絡中；(2)瞭解媒體地方感的形塑，如何透過影集的消息來源、內容編輯及鏡頭運作等，以建構安坑的地方圖像，並進而達成「土地關懷」之目的。

理論探討

(一) 環境正義

環境正義是近年來環境社會學中發展最迅速，運用範圍也最為廣泛的領域之一。「它的最主要關懷是在資源逐漸匱乏、環境破壞愈來愈嚴重的今天，少數族群與弱勢團體的土地與資源被侵佔，以及他們被迫承受主流社會的各種廢棄物毒害之問題」(紀駿傑, 1996)。環境正義的關懷起點，是對於「貧窮的人居住在惡劣環境」的發現(Dobson, 1998)。1983 年美國主計室(U.S. General Accounting Office)調查全國鄰避設施(not in my backyard, NIMBY)的設置地點，發現有四分之三的有毒廢棄物傾倒於貧窮、黑人及拉丁裔族群的社區中，環境正義問題始受到重視(王俊秀, 1999)。1987 年，美國聯合基督教會種族正義委員會(United Church of Christ Commission for Racial Justice)執行長 Chavis 在全國報刊俱樂部發表環境種族主義時指出，美國境內的少數民族社區長期以來不成比例地被選為有毒廢棄物的最終處理地點，環境正義問題因此更受到社會輿論的關注(Prout, 1999)。「在 1980 年代末期，美國南方所有的有毒廢物處理容量中，有 63%是在黑人社區，而黑人在南方只佔總人口的約 20%，就全國而言，五個最大的商業有毒廢物處理場中，就有三個是座落在以黑人及拉丁裔人為主的社區」(紀駿傑, 1996)。當金錢向主流社會匯流時，經濟外部性或污染產生的社會成本卻由非主流社會或弱勢族群來吸收，這樣的現象震驚了當時的社會大眾，也引起了環保人士對於環境正義的積極訴求。

在地理學界環境正義議題也受到相當關注，尤其是在政治地理面向上。Johnston 等(2003)將環境正義定義為：「一個從社會正義的觀點去表達環境訴求的社會政治運動，它關心的範疇包括世代間的福利及權利，對於種族、性別、階級及國家的平等關懷，甚至這些正義的權利呼求也擴及到對非人類的大自然物種。」Williams(1999)曾以不同的地理尺度(當地/國家/國際)探討政治對美國環境正義的影響，並分析不同地理尺度的環境正義運動對政策的衝擊，結果指出有些草根團體所進行的環境正義運動獲致相當成果，包括不公平對待獲得改善、規劃中的有毒設施建廠計畫被凍結，以及引起全國或國際間的注意。Dawson(2001)則探討後蘇維埃世代，拉脫維亞少數民族在政治、經濟及社會面向上被邊緣化的問題，並分析邊緣化對區域發展及環境正義之衝擊，他發現新的有毒廢棄物設施大都設置於少數民族居住區域，環境歧視日益嚴重，並擴大已開發及未開發區域間之差距。此外，地理學者 Kurtz(2003)亦曾探討美國路易斯安那州化工廠環境正義問題；Holifield(2004)則分析美國環保署在政策上如何落實環境正義，讓邊緣化社區能在政治上獲得權力，在經濟上能自給自足。

至於環境正義運動的理論脈絡則有許多不同的分類及論述，著名的地理學者 Harvey(1996)在探討環境論述及社會正義原則時，曾分別指出包括實用主義(utilitarianism)、契約主義(contractarianism)、平等主義(egalitarianism)、自由主義(libertarianism)及社群主義(communitarianism)等不同理論脈絡在環境正義上看法之異同。Low 及 Gleeson(1998)則從政治生態學角度將環境正義理論區分為五大類，包括：(1)實用主義：透過社會經濟及政治管理等手段尋求最大的利益；(2)賦權理論(entitlement theory)：重視財產獲取及財產交易的公平正義；(3)契約主義：強調人人擁有與生俱來的公平權利與機會；(4)社群主義：關注社區的認同 自主與合作；(5)言說倫理(discourse ethics)：重視公開對話與表達意見的自由。Liu(2001)回顧過去相關文獻後將環境正義理論區分為四大類，包括：(1)實用主義：透過政治經濟手段，讓財貨及服務能被生產與分配，使社會能獲得最大化的福祉；(2)契約主義：主要源自於 Rawls 的社會正義理論，每個人都應具有社會契約的共識以分配資源，也就是每個人都具有相同的權利與機會；(3)平等主義：與契約主義同樣強調人人平等，但更注重現存不平等的移除，所有的不公不義都是不必要的且不能被合理化；(4)自由主義：特別強調自由市場、私有財產權、自願買賣及自由選擇的重要。國內學者王俊秀(1999)則將環境正義理論概分為倫理論、解放論及超越論等三個面向，就倫理論而言，「從自然權(natural right)朝向自然的權利(the rights of nature)，亦即自然權的典範轉移由人類中心主義(anthropocentrism)、生命中心主義(biocentrism)、而到達生態中心主義(ecocentrism)，是環境正義得以透過倫理層面而彰顯的重點所在，環境正義者視世界萬物為一生命共同體，認為萬物皆有其與生俱來的價值，而人類只是地球社群裡的一份子」；解放論的脈絡則回歸到人類歷史所經歷的三種解放歷程，分別為黑奴解放 - 代表社會正義的再現，殖民地解放 - 代表政治正義的抬頭，以及自然解放 - 則是環境正義的象徵，「被虐待的自然」等同「被虐待的人」，而自然的解放則隱含著「自然人格化」；至於超越論則強調在思想及行動上展開逆轉，以超越自我、超越國界及超越成長迷思；超越成長迷思是對抗資本主義下不義的經濟成長模式，主張從事結構性的調整，強調發展而不成長。

環境正義所分析的主體已日益多元，除了人類本身間的公平正義之外，有生命的物種甚至是生態系中的組成，其權利與正義亦逐漸受到眾多學者的關注及探討。Harvey(1996)在探討環境正義時曾指出，環境正義不只是討論以人類為中心的問題而已，其實環境正義已擴及到所有的生命，實用主義者將關注許多有用物種的繁盛與增殖，契約主義者建議透過保育途徑以確保瀕臨滅絕物種的生存權利，平等主義者以深層生態學(deep ecology)為基礎關心所有的物種及棲息地，自由主義者則特別強調生命權例如動物權等。Dobson(1998)認為環境正義必須確保地球的神聖不可侵犯、生態的整合以及所有物種的相互依存，並確保自由的權利以避免生態毀滅。Low 及 Gleeson(1998)亦指出：「由政治所形塑出的正義包括兩個面向，包括人群中環境分配的正義，以及人類與自然世界關係的正義」，我們除了關心人類間環境品質分配正義問題之外，我們也應以較深層的感受(deeper sense)來省思人類與非人類自然世界間的環境意義，進而尋求人地關係的生態正義(ecological justice)。Stavis(2000)認為傳統的環境正義常是以人類為中心去思考環境的分配問題，並未將自然納入平等地位對待，生態中心主義者對此甚為批判，並認為生態正義概念將有助於增強環境正義的深度與廣度。Bennett(2004)亦指出，環境正義運動不只是與環境種族主義者爭鬥，更應為會影響貧窮社區的相關生態議題而努力，整合不同種族、族群、物種及生物，提供空間平等及永續社區的願景。綜合上述，環境正義不應只是人類間的公平分配問題而已，所有的物種甚至是生態系也都應被考慮在內，皆應受到應有的關注與對待。

(二) 媒體地方感

地方一直是地理學界所關注的話題，一個人與一個有範圍的地理場所產生關聯，即彰顯了地方的意義(Hay, 1998)。Galliano 及 Loeffler(1999)亦指出，地方是對人們有意義的地理區域，透過對地方的情感建構，人們才會歸屬或瞭解此一地理區域。基於這樣的認識，地方感常被視為一個人對某地方的歸屬感與安全感，感覺自己是屬於那地方的，並對那裡的認同產生了聯繫(Hay, 1998)。「地方感是社會、文化、歷史、環境、政治所建構的觀念，它是看不到、摸不到的主觀感覺，它是個人或群體的經驗與記憶」(蔡文川, 2004)。

地理學界對地方感的研究深受現象學所影響，其中又以人本主義地理學界的研究為最多，如段義孚將地方感與個人經驗、地方愛作聯結，強調地方感是因為對一個地方的心理需求而自然發生(Johnston, 1991)。然而，在 20 世紀全球化的浪潮下，大眾傳播科技的盛行讓閱聽人得以在自家客廳中得知世界上各個角落發生的事，一個從未到過的地方的影像，也輕易地透過電視等媒體傳送到閱聽人的腦海，於是傳統的地方感有了新的詮釋。Meyrowitz(1985)就指出，電子媒體改變了人們的地方感，人們因為科技的進步創造出一種新的社會關係，人與人不需要再倚賴實際的碰面而發生或維繫感情，也不需要非得踏進一個地方，才對該地產生情感及認同。Meyrowitz(1985)認為這樣的傳播科技衝擊著社會關係改變，會使人們喪失對所在地方的經驗感情，形成無地方感(no sense of place)。Rantanen(2003)則從另一個角度提出地方感的詮釋，他認為隨著電子媒體的問世，一種閱聽人的地方感(reader's sense of place)即被創造出來，閱聽人不但沒有因為全球化而喪失地方感，反而因為對其它地方有更多的知覺，而獲得一種新的地方感(new sense of place)。有別於 Harvey(1989)的時空收斂(time-space compression)及 Giddens(1990)的時空分離(time-space distanciation)論述，Rantanen(2003)認為在現代化過程中，大眾傳播媒體在報導新聞時提供了一個認同的觀點給閱聽人，這種認同的賦予讓閱聽人在同一時間存在於兩地成為可能，並且強化了他們對該地的地方感。

媒體可以再現出一個地方的圖像，然而不是所有媒體的再現都與實際情況相符。Bushman(1997)就指出，有許多地理學者陸續關注電影工業及大眾傳媒對於地方文化再現的影響，並且著手媒體對於地方感形塑的研究，以美國猶他州 Bonneville 地區為例，由於該地鹽分高、地勢平坦、地景特殊，有許多電影工業及大眾傳媒在此拍攝採訪，但所呈現出來的地方感只是媒體本身所要的地方感，包括人間樂土、孤寂荒蕪、運動場所及奇異超現實等主題。Myers 等(1996)分析美國媒體對於盧安達內戰的報導內容，發現他們引用的消息來源全是非非洲人，並且扭曲該事件成為一個無時間及無地點的部落糾紛，盧安達在美國文化下被置放為「他者(others)」。Pauly 及 Eckert(2002)更指出，在近兩世紀來，新聞報導幫助人們創造或維持了對地方的感覺，新聞組織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控制了地方的意義；報紙對地方的概念常會有排他和偏頗的現象，記者會因為某種考量而選擇消息來源，而他們對於地方的概念形成，並不是將社區中所有人的意見都包含在內，而是藉著意識型態的運作，媒介會引用某些團體的觀點而忽略另一些團體的觀點，再現出特定的地方圖像。鄭玉惠(2000)進一步指出地方感與權力結構的關係，她認為經濟再結構下的空間生產有不同的權力關係，各個權力結構對地方的印象或發展有不同的詮釋或意見，地方感於是在權力結構的論述中被建構出來。由此，我們可以發現，消息來源(權力結構)與記者可以共同建構一個地方的圖像，以強化特定的論述言說，經過大眾傳播媒體再現給閱聽人，使觀眾對此特定論述產生認同，並建構對這個地方的地方感。

研究方法

本研究以公視「我們的島」節目第 217 集「斯士安康」影集作為分析樣本，試圖拆解其中所隱藏的環境正義意識型態及觀點，並探討新店安坑被該節目所形塑出的媒體地方感為何。選擇「斯士安康」影集作為分析樣本的理由如下：(1)「斯士安康」的故事背景是關於新店安坑居民反對掩埋場進入的抗爭，具有典型的鄰避現象(譚鴻仁及王俊隆，2005)，符合本研究探索「我們的島」如何呈現環境正義的需求；(2)「斯士安康」總長 40 分 50 秒，長度比其他一般單元還長，有助於本研究深入分析；(3)此單元就佔掉第 217 集近八成的時間(其餘時間則報導「鍋米再見」影集)，顯示出此議題的複雜性及「我們的島」節目對此議題的重視程度。在樣本拆解的分析手法上，Jensen 及 Jankowski(1991)彙整了兩種取徑作為大眾傳播研究中質化分析的方法，一種是以批判語意學(critical linguistics)為背景的論述分析(discourse analysis)，適合用來拆解大眾傳媒中記者所引用的、以及記者自身的言說，存在什麼隱而未見的觀點。另外一種則是符號學(semiotics)取徑，可適用於拆解記者的影像攝取及運鏡手法所欲傳達出的想法或意識型態。本文以深度報導之電視節目作為分析樣本，關於影片中文字言說的部份正可運用論述分析，而運鏡手法、聲音、影像等元素的拆解，則運用符號學取徑。論述分析及符號學取徑的研究方法詳述如下：

(一) 論述分析

論述指的是一系列意義、隱喻、再現與陳述，以特定方式與角度呈現事物的被描述圖像，並與日常生活的社會結構與實踐緊密扣合(徐美苓及丁智音，2004)。蘇峰山(2004)則定義論述為：「論理、交談(之進程)，以及論理交談所呈現的具體形式內容(一段談話、一篇文章)，其關鍵乃在於語言文字成為獲得理論、溝通的工具，藉由語言運用形成意義往返運動的過程。因此，論述這個概念，可以引申為兩個人之間的交談、多人之間的交談、授課、演講 乃至於大眾傳播的形式與過程」。

把論述分析應用到公共論述，運用語言學知識以投入媒介文本研究的，首推 Roger Fowler(倪炎元，1999)。他在 1979 年提出批判語言學的概念，把分析焦點集中在公共論述中所隱含的意識型態符碼，並且揭露這些符碼的語言分析策略。Fowler(1991)提出了幾種批判語言學的分析方法，包括動詞的及物性分析(transitivity analysis)、句法分析(syntax analysis)、詞彙分析(lexicon analysis)、情態動詞分析(modality analysis)等。Fowler 也強調主動語態和被動語態之間的意義差別，他認為，在句子的主動語態中，居主詞位置的名詞或片語有其責任歸屬，而被動語氣常常將這種責任歸屬給淡化，尤其轉換到賓語位置的參與者往往被省略(倪炎元，1999)。例如，「美國攻打伊拉克」，美國在這個句子中居主詞地位，若將這句話改寫成「伊拉克遭攻打」，則把攻打伊拉克的主詞(美國)給巧妙地省略、淡化掉。戴育賢(1994)曾使用 Fowler 的論述分析法拆解晚間電視新聞中關於「初二回娘家」的報導，他發現這篇報導中的最後一段記者隱藏了行動者主詞，而這段言說的主詞其實是記者本身；另外，他發現在敘述語氣的使用上，男性的論述具有威權的語氣特徵，而女性的論述則是不確定的臆測語氣，男性中心的婚姻家庭制度獲得鉅細靡遺但又不著痕跡的正當化。

Van Dijk(1991)亦曾把論述分析運用在新聞文本上，他認為我們所有的社經知識及對世界的認識，大部份都是來自於我們每天所接觸到的新聞報導，除了每天的交談之外，似乎沒有其它管道比得

上新聞報紙或電視使我們涉入地如此頻繁。Van Dijk 致力把他發展出來的論述分析途徑應用在新聞媒體，尤其是報紙新聞的意識型態分析上。他對新聞的分析焦點有三個面向，一是新聞的結構，其次是新聞的製作，再來是新聞的理解(Van Dijk, 1988)。在這三個面向中，與本文有直接關係的是新聞結構的研究中關於局部結構(微觀)的分析，在局部結構的分析策略方面，Van Dijk 承襲語言學的傳統，強調運用語法學及語意學。其中語法學研究的是哪種語法範疇所組成的句子形式是有規律的，而語意學則論及詞彙、句子和話語的意義(Van Dijk, 1988)。它的主要分析單元為新聞論述中的各別命題，而分析的取徑主要是檢視個別字彙與語句的策略性意義、功能以及語句間的關聯，同時也檢視其意義背後相關修辭與風格的操作，以探究文本中隱而不顯的意涵，如意有他指的預設、模糊焦點的含混，以及提供過多或不相干資訊的過度表述等(倪炎元，1999)。Van Dijk 對意涵的分析十分重視，他認為在對新聞的批判分析中，意涵是最有力的語意學概念之一，大部分文本資訊都不以明確的方式表達，而是採取暗示，分析這些文本中「沒說出來的」比分析「實際表達出來的」還具有啟發性(Van Dijk, 1991)。

(二) 符號學取徑

要研究是什麼使得文字、圖像或聲音能變成訊息，就必須研究符號，而研究符號和符號的運作的學問就是符號學，一般而言，符號學有三大研究領域：符號本身、組成符號所依據的符碼或符號系統，以及符號或符碼運作所依之文化(張錦華等譯，2001)。符號學之探究重點在於符號概念的意涵，關於符號概念符號學之父 Saussure 提及了兩個名詞，也就是符徵(signifier)及符旨(signified)，符號 = 符徵 + 符旨，他認為符徵指的是聲音與形象，而符旨指的是人的心理概念(許如婷，2000)，而符徵與符旨之間沒有必然的關係存在，它們的關係是由社會慣例、法則或約定而來的。Berger 曾就影像的符號學分析提出一些定義，他認為不同的鏡頭拍攝方式代表不同的意義，特寫、中景、遠景及全景都具有不同的意涵，此外，攝影機的操作與剪輯技巧亦呈現出不同的意義(黃新生譯，1992)。Field(1988)也提出了質性的影像內容分析應注意的要項，包括記者或受訪者的聲調起伏、說話的速度快慢及他們的臉部表情等。總而言之，質性的分析方法應同時關注到言說及影音的分析。

以影片的分析模式而言，用文字表達電視節目中連貫相承的語言和影像，有些限制是無法克服的，所以傳播學界中對於影像訴諸於文字的分析並無一定的典範。Williams(2003)曾以流程分析(analysis of flow)拆解 BBC 晚間新聞，他以新聞中出現的人物順序加以編號，並在其後述寫其發言之內容，中間再穿插簡短的影像描述。Field(1988)則以表格的方式書寫影片內容，將影部、腳本、發言人、文本種類分開，分別加以描述。而國內關於電視新聞拆解的研究多是引用類似 Field(1988)的手法，將影片分為聲部及影部兩部份再加以分析(戴育賢，1994；許如婷，2000；陳右果，2004)。本研究則直接引述影片中的聲部言說，再於內文分析中探討記者取鏡、影像呈現、聲音運用(影部)所隱藏的意識型態。

環境正義分析

透過論述分析與符號學取徑拆解後，本文發現在「斯士安康」影集中，主要有二個面向呈現出環境正義的理論脈絡：第一，強調生態中心主義，彰顯自然山林具有與生俱來的存在價值與基本權利，呼籲社會大眾尊重生物多樣性，並勾勒未來永續發展願景；第二，塑造居民弱勢圖像，凸顯環境風險

分配不當，進而強化對於環境不公的控訴，並引起閱聽人的共鳴。對照於環境正義的理論脈絡(Harvey, 1996; Low and Gleeson, 1998; Liu, 2001)，第一面向具有平等主義的色彩，第二面向則有契約主義的意味。

(一) 強調生態中心主義

生態中心主義是環境正義理論淵源的一環，Bennett(2004)在分析近代綠色主義的不同思潮時，認為環境正義運動巧妙地将公民權利與主流的環境主義(指的是生態中心主義)作結合，它讓人們知道，有色民族正面對環境品質下降與毒害的不平等對待，而對生態中心主義的擁護者來說，保護瀕臨滅絕的物種與荒野也無疑就是保護那些受到環境不平等對待的人們的生存空間。Miller(2002)曾舉出數點生態中心主義者所持的觀點，包括：

1. 我們人類只是地球的一部分，大自然並非是為了我們而存在。我們需要地球，但地球並不需要我們。
2. 地球的資源是有限的，不應該被浪費，為了我們也為了其它的物種，我們應該更有效率及永續性地使用自然資源。
3. 對環境有利的科技和經濟開發行為是可以被鼓勵的，但那些對環境有害的應該被禁止。
4. 我們的成功取決於：(1)學習地球是如何適應多變的自然情況，以及(2)將生態智慧融入科學課題上，形成我們思考和行動的方法。

在「斯士安康」影集文本中，記者一方面祭出保護生態的論述策略，另一方面也在敘事中散發出濃厚的生態中心主義觀點。如同下面這段對話與旁白：

牛伯伯：這邊都還是我的地，他這一次測量把我種的蝴蝶食草都砍掉了。有沒有輕鬆一點的？這裡其實有很多竹節蟲。有了！很好玩哦！

記者：這個叫什麼？

牛伯伯：竹節蟲，這個叫冷清草。那我們竹節蟲不是叫你們看，我們來都是教什麼你知道嗎？都是教小朋友，當你碰到螳螂或竹節蟲的時候，怎麼玩。第一個，動作放慢，最好用背面、手背，手臂比較黑，牠比較不會緊張。然後輕輕 哇，這隻較老奸。這樣輕輕地摸牠屁股牠會爬到你手上來。一般小朋友可以玩接龍，像這樣，牠不上來你就摸牠屁股，玩過以後再叫他們放回去，這樣他們才會體會，哦 原來人跟大自然可以那麼好。

旁白：經過牛伯伯十多年的復育，安坑下游才由遍佈土石流的山谷以生態蝴蝶園的面貌重生，然而當一片天然林地對上以成功開發掩埋場為前提的環境影響評估，無價的自然生態竟然顯得一文不值。

在這段的影像敘事中，背景為牛伯伯蝴蝶園，鏡頭隨著牛伯伯的步伐前進勘查掩埋場界線。一開始記者將鏡頭刻意拿低，以拍攝牛伯伯赤裸前進的雙腳，直到牛伯伯講話後鏡頭才漸漸拉遠至全身，這種運鏡手法是 Berger 所謂的「權力、威嚴」符碼(黃新生譯，1992)，暗示記者以尊崇的角度塑造牛伯伯的形象。此外，鏡頭特別強調牛伯伯不穿鞋子，讓觀眾在尚未聽到他說話之前，從他的打扮(符徵)就已經預設出他可能是個時常接近大自然的人(符旨)。

竹節蟲的特寫鏡頭超過一分鐘，然而，這段由牛伯伯臨時起意而上演的竹節蟲環境教育，其實和安坑掩埋場的本題論述沒有任何關係，但是記者仍花了相當多的時間把牛伯伯把玩竹節蟲的畫面呈現在影片中，長度甚至比給掩埋場開發承包商發聲的時間還長。這樣的敘事方式原因可以從兩個層面來探究，第一，雖然僅是單純的生態解說教育，但隱而未見的論述則是：「若不阻止掩埋場開發，竹節蟲的棲地恐將遭到破壞，牛伯伯的生態解說也將不復見」。其次，牛伯伯解說竹節蟲的畫面是要為片尾牛伯伯建請停建掩埋場作伏筆，換言之，記者用這些時間和畫面建立牛伯伯是個「關心、瞭解生態的大自然義工」的專業形象，讓片尾牛伯伯的論述(其實也是記者的結論)更具說服力。

「語言從來不是價值中立的，在新聞記者看似中立的報導中，往往隱藏了太多的意識型態與權力關係，讀者只有在充分掌握了「批判的語言警覺性」以後，才能洞視在文本中到處流竄的意識型態和權力關係」(翁秀琪，1998)。在竹節蟲生態解說的尾聲，記者旁白先是以「復育」、「重生」等詞彙讚賞牛伯伯的成就，再以嚴詞批判環境影響評估，將環境影響評估冠上「以成功開發掩埋場為前提」的形容詞。而在這裡，「開發掩埋場」已經被污名化，「開發掩埋場」在影片中已經不是一個可供討論的議題，反而一躍成為記者眼中之惡。

以生態關懷為論述的影像敘事陸續出現在「斯士安康」的文本中，以下這段在立法院趙永清立委舉辦的公聽會中安康居民發言的畫面，亦是影片敘事之一：

居民：我在這邊要為荒野請命，要為山林請命。請問一下我們環境評估的時候，那塊山林裡面有幾種保育類？請問誰可以回答我？

趙永清：說明書說裡面沒有啦！說這裡面沒有值得保留的自然文化景觀。

居民：那為什麼我們一群夥伴做的保育類的調查有二十幾種呢？請大家看看！好！我先介紹一下裡面有什麼：兩棲類十種、昆蟲四種、鳥類四種、哺乳類兩種，請問為什麼環境評估都不知道呢？

探討環境正義時，Merchant(1996)的「夥伴倫理(partnership ethic)」四句格言常可作為生態中心主義者對環境正義看法之代表(引自 Low and Gleeson, 1998)：

1. 人類與非人類社群間平等。
2. 道德考量人類與非人類社群。
3. 尊重文化多樣性與生物多樣性。
4. 納入女性、少數族群及非人類自然於倫理責任中。

安坑居民以「動植物保育」作為論述要點，鏡頭先以中景方式呈現出居民高舉保育類圖片訴說情形，強調民眾積極投入調查的成果，並與這些動植物建立親密關係，接著鏡頭再以近景方式完整呈現民眾手中保育類動植物的圖片，暗示環境影響評估過程草率，並且漠視野生動植物生存權力，此聲部與影部操作手法恰可彰顯出「我們的島」對於「生態中心主義」觀的思考傾向，也呼應 Merchant「夥伴倫理」格言中的精神。Stavis(2000)指出，人類中心主義與生態中心主義最明顯的差別是前者將自然視為工具，而後者則強調自然具有與生俱來的價值。王俊秀(1999)亦指出：「人類必須免除對其它種族及萬物的刻板化印象，並應去除對自然的傲慢及殘酷，而向自然謙遜地學習，人類要體認自己只是自然界的一份子而非萬物之靈」。在影片敘事中，居民疾呼「要為荒野請命，要為山林請命」，他們將這

裡的荒野山林擬人化，並強而有力地凸顯出安坑地區的荒野山林具有與生俱來的存在價值與基本權利，它們不必然一定要為人類而服務，甚至被人類視為工具而被加以開發利用。此外，當地居民自發性地從事生態資源調查，發現此處荒野山林中存有「兩棲類十種 昆蟲四種 鳥類四種 哺乳類兩種」，此結果雖非依據科學性的系統調查，但背後所呈現出的調查意義就是「尊重生物多樣性」並「去除對自然的傲慢及殘酷」。

「斯士安康」影集中的生態中心主義論述可以在牛伯伯被塑造的形象中不斷地被發現，從牛伯伯把玩竹節蟲的舉動，一直到片尾記者以牛伯伯的話語作為總結，在在都可看出記者要推崇的是如牛伯伯這般地融入自然的心靈與情境，最後並透過牛伯伯的言說，進而勾勒出永續發展的願景。以下是影片結尾關於牛伯伯的論述：

牛伯伯：現在的台灣實在已經不容許，包括縣政府，總統也好或是再大的財團，都沒有人有這個權力，可以把上百甲那麼美麗的山林變成垃圾山。台灣有多少山林可以讓他這樣破壞？這是一個迫切時代意義的思考。縣政府假如不趕快改變這個基本觀念的話，我們的子孫、台灣的歷史一定會記下這一筆。到時候真的鬧起來的話，真的大家都輸。

牛伯伯結語的效果從故事的一開始就已經開始醞釀，他從一個單純的受害者的角色，經過影像加工鋪陳，不斷地在片中彰顯自己對環境的敏銳深入和生態的瞭解認知，正向且鮮明的人格特質也陸續在影片中顯露，使得他得以成為貫穿全片的關鍵人物，也享有最多抒發結論的媒體近用權。從「各單位皆無權破壞山林」到「時代意義的思考」，他的論述其實充滿著環境正義的主張，也與永續發展的論點不謀而合。Harvey(1996)曾指出，環境正義必須整合長期的永續性。Agyeman 及 Bob(2004)探討環境正義在現代社會及環境政策上所扮演的意義時亦指出，環境正義的論述在現代社會中已漸成熟，並且有愈來愈多的證據顯示環境正義與永續發展的議題密切相關，他們進而提出「just sustainability」的詞彙，來表達環境正義與永續發展密不可分的關係。顯然地，「斯士安康」影集以生態中心主義作為環境正義的主要論述之一，並與永續發展作為連結，此敘事策略確實有助於獲得閱聽人的認同。

(二) 塑造居民弱勢圖像

環境正義的起源及本質與被壓迫及被奴役的本體密切有關，尤其是那些少數族群及有色人種等弱勢團體，遭受到環境不公對待最為劇烈明顯。在新店安坑這個案例中，「斯士安康」影集將當地居民塑造成弱勢形象，凸顯環境風險分配不當，進而強化對於環境不公的控訴，並且引起閱聽人的共鳴，而居民的弱勢形象從影片的一開始就已呈現。以下是「斯士安康」的片頭影像敘述，背景為安坑掩埋場說明會居民的抗爭畫面：

旁白：「我們的島」今天要告訴您一個灰渣掩埋場開發案的故事，故事發生在台北縣新店安坑，安坑居民的事跟電視機前的你沒有一點關係，但是我們建議您一起來關心，因為在不久的將來，安坑居民的遭遇很可能也發生在你的身上，就像安坑居民當初也沒有料想到一樣。

在影片導言的旁白論述中，記者用「居民的遭遇」、「沒有料想到」等用語，搭配居民示威抗議的

畫面，暗示安坑地區的居民在「沒有料想到」(其中隱含著「無辜」、「無緣由」)的情況下，遭到不平等的對待以及委屈，記者在這一段的論述中已經暗示安坑居民是一群無辜的受害者。在影像的敘事策略上，記者運用特寫鏡頭，不斷呈現出以老人、市井小民及婦女等較為弱勢的庶民臉孔，藉以激起觀眾的同理，同時，庶民階級的愁苦面容亦帶給這段畫面相當強烈的戲劇張力。

Bourdieu 認為，記者們因為職業本身內在的傾向、世界觀、養成、愛好，也因為其職業邏輯的推動，而在看待事物時使用了某些特定的方式；他們對事件本身進行選擇，並且建構了所選擇的事物；電視會導向戲劇化的選擇原則，一方面它會把一個事件置入場景、形象的形式之中，另一方面，它又會誇張其中的重要性、嚴重性、戲劇性和悲劇性(林志明譯，2002)。悲劇性的敘事元素出現在這短短三十秒的片頭中，民眾愁苦呼喊的面容用慢動作的影片速度播放，讓觀眾更清楚地看見居民無奈的表情，片頭的最後，畫面在老人悲涼的臉孔特寫中淡去，預告著這個故事是一齣居民受難的悲劇。

表達立場慣用的手法除了文字及影像元素外，透過鏡頭的取景也是常用的影像敘事策略之一。在這段的影像文本中，記者以鏡頭跟拍抗議居民，採取站在抗議民眾這邊，用抗議民眾往外觀看的鏡頭取景，而非站在警察防守線後方對抗議民眾拍攝，此種拍鏡方式即表達了「我們的島」是站在抗議民眾這方，而不是防守線後方那些開說明會的掩埋場廠商的立場。另外，這樣的運鏡角度用在民眾推擠警方防線的畫面，由民眾的後方拍攝取代從警方角度直接面對民眾施力，也相當程度地淡化了民眾可能強烈的肢體動作，而不會給閱聽人對當地民眾有粗暴、蠻橫的負面印象。

塑造居民弱勢形象的敘事元素一再出現在此影像文本中，例如在影片前半段出現的掩埋場說明會，老者控訴居住環境不良的片段亦是一例：

老人：現在全家八口都住在這裡，祖孫三代。一邊有焚化爐，又再加上掩埋場，相距不到一公里的距離。我天天要聞這個臭味，天天要塵灰落到客廳的地方，你有這樣的忍耐嗎？你是怎樣評估的以前我不管，現在我們的訴求，就是不要這個掩埋場。大家說對不對？

在這個影像敘事中，白髮蒼蒼的老者以受害人的角色出現，拿著麥克風向環保局長陳情，記者以近景描繪老者激動的神情，老者臉上的皺紋清晰可見，這樣的特寫鏡頭構成相當程度的控訴意涵，也彰顯焚化爐及掩埋場在場址設置上的環境不公。公聽會場民眾發聲者眾，老者的控訴獨獲記者青睞，而給予四十秒長度的發言空間，在在顯示以老人等弱勢族群作為影像立論的佐證，確實能帶來激化同情的效果。

除了運用老者悲苦面容作為塑造居民弱勢形象外，在這影集敘事中，「我們的島」還運用市井小民言說的策略，來引起閱聽人的關懷。這段達一分二十秒的畫面即是一例：

記者：這水哪邊接過來的？

青年：從山上流下來的。

記者：你怎麼會想要來參與這個掩埋場的案子？

青年：要搬也搬不走啦！一個月賺幾萬塊而已，也不可能離開這地方了啊！為了這個家也沒辦法。像人家講的，買到倒楣，可是也不能一直讓它倒楣下去。

記者：那你想可以做到什麼樣子？

青年：如果他們有活動我就來參加，讓他們知道，民眾就是不喜歡事業廢棄物掩埋場。我只能參加而已啦，我一個人小小的力量而已。

青年：我期待當然是不要做啊！我只有這一個家而已啊！希望可以看到外面有一個山林，我也不求說有什麼好的東西給我，就像我的環境。我生活起來看到的就是漂漂亮亮這樣子，綠綠這樣子，我就很滿足了。我不求說河濱公園那個我都不求。我現在只要沒有掩埋場的煩惱就好了。

在這一段的影像敘事中，記者將發言場域交給一名安坑在地的青年。青年以山泉洗手的動作出現在鏡頭中，暗示著青年熟悉這片山林，且與大自然關係親密，「親近自然」的形象一開始就被賦予在這個青年的身上。接著記者以對青年近距離半身的特寫，加上青年本身笑容可掬的神情，無形中化解了觀眾對這名青年的隔閡，反而增添了些許親切，建構出了青年在敘事中正面的形象。接著在青年的論述中我們可以發現，市井小民的形象在他的身上愈益顯著，例如他談到自己「一個月賺幾萬塊而已」、「一個人小小的力量」，如此對自身的描述符合一般社會大眾對於市井小民的印象。觀眾的同理與青年的形象建構來回激盪，使得青年看似微小、對於不希望掩埋場進駐的願望，對觀眾產生的效果其實並不亞於居民抗爭的衝突性畫面。

除了有老者、市井小民等相對弱勢形象的敘事元素之外，女性也出現在「我們的島」塑造弱勢的敘事策略中，而且這樣的形象塑造在後來透過剪輯的技巧而產生巧妙的轉換，以下面這段安坑婦女們拿連署申請訴訟的片段為例：

旁白：對安坑居民來說，連署要求進入二階環評是他們唯一的要求，安坑媽媽展開新一波的連署行動

記者：你們現在要採取公民行政訴訟有怎麼樣的效果？

婦女：要他至少先讓他不要一次又一次的欺騙我們，要他們開說明會啊！他從 5 月 30 號說要開公聽會又變成 5 月 16 號，這天我們吵了又變成 6 月 24 號，現在一下又說 7 月 2 號，現在又說是 7 月 7 號，人民的體力被他這樣一直消耗掉，我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吧！

在這段的敘事策略中，安坑媽媽一開始也被賦予「被欺壓」、「受欺侮」的形象角色，而這樣的形象建設，其實是這位安坑媽媽自己行使的語言策略所造成的，例如：「至少不要再被欺騙」、「人民的體力被他消耗掉」、「我們有免於恐懼的自由」等言說，即明示自己在這整個事件過程中是「被欺騙」、「體力被消耗」，以及「心生恐懼」的受害人。記者在此稱呼她們為「安坑媽媽」，也帶有認同及親近的意涵。

節目中透過老者、市井小民及女性等角色形塑出安坑居民的相對弱勢形象，以凸顯廢棄物環境風險的分配不當，進而強化對於環境不公的控訴，此敘事策略正呼應契約主義的論述，強調人人應有公平的權利與機會。Harvey(1996)曾以美國巴爾的摩市鉛毒害事件為例指出，對信奉 Rawls 社會正義的契約主義者而言，不公平的暴露風險是一嚴重問題，不應有任何的特權，所有的團體均應共同將有毒物質排除在外。Low 及 Gleeson(1998)亦指出，契約主義者強調每人都有要求公平的權利，獲得相同的政治、社會及經濟機會，他們認為公平的環境品質是最基本的正義，由於人類依賴於他們生活及工作環境中的品質，在日常生活中也與非人類的自然世界息息相關，因此，必須具有公平的環境品質才能符合環境正義，而原住民、弱勢族群及被殖民者則常遭受到環境不公的對待。Dobson(1998)亦以美

國為例指出，環境正義運動具有明顯的草根特質，環境不公問題常常不是由著名的環境專家或環境主義者所發現，相反地，環境不公卻常是由遭受環境惡化所苦並影響到其日常生活的當地居民(尤其是女性)所呈現出來。「斯士安康」影集透過弱勢不公形象的建構，除了展現當地的草根力量之外，安坑居民積極抵抗廢棄物掩埋場的設置也獲得了正當性與合理性。

有趣的是，這樣的弱勢形象不久就因為記者的運鏡及剪輯技巧得到轉換，在這位安坑媽媽的言說結束後，記者運用跟拍錄影的鏡頭，記錄安坑媽媽由住處開車前往趙永清立委服務處請求協助的過程，畫面中適時秀出「安坑媽媽帶著兩千多人的連署書委請律師提起行政訴訟」詞句，並且將鏡頭上抬聚焦在大樓「永保安康」的字樣上。在這段約 30 秒的畫面，安坑媽媽們不發一語，上車、開車、行走，行動迅捷，鏡頭從安坑媽媽身後跟拍，收現場音的同時播放節奏明快的樂曲，這段畫面將這群安坑媽媽形塑成「正義使者」的印象，她們手執連署書，以堅定的步伐要替安康居民討回公平正義。

政治地理學者 McFarlane 及 Hay(2003)曾以澳洲唯一的一家全國性日報「The Australian」為研究對象，研究該報對於 1999 年 12 月在西雅圖舉辦的第三屆 WTO 大會是持什麼樣的態度，他們發現，該報的立場傾向認同 WTO，而且消息來源多以官方為對象，另外，他們也發現該報對於那些在會場外抗議 WTO 的示威者所施予的語彙和形容，有非法化(delegitimize)、邊緣化(marginalize)，甚至是妖魔化(demonize)的傾向。相較於 McFarlane 及 Hay(2003)的發現，公視「我們的島」對於安坑地區抗議居民的形象則採取合法化、主流化，甚至是神人化(如安坑媽媽化身正義使者)的策略，這也顯示，媒體對議題的特定立場，會使他們在有意或無意中貶低他們不認同的那方，而給予他們認同的那方較多的資源與較佳的形象。

媒體地方感分析

地方感可透過不同的權力論述來建構，而媒體在對這個地方所施予的報導，經過有意或無意的引用消息來源或拍攝角度，再現出了某一方或多方，甚至是媒體自己創造出的地方形象，這個地方形象再藉由電視影像或其它媒介形式傳輸到閱聽人的腦海中，賦予閱聽人對於這個地方的認同觀點，建構或強化了閱聽人對這個地方的地方感。以安坑的例子來說，官方、掩埋廠商、當地居民，甚至是傳播媒體本身對地方發展都會有不同的想像，他們對安坑的地方感不盡相同，在權力拉扯的場域中(實際的地方、公聽會，或是媒體空間)，誰的論述能顯得正確有力，誰的地方感就居主宰地位，而這樣強勢論述的地方感經過大眾傳播媒體再現給閱聽人，使觀眾不必與該地方有經驗上的聯繫，就能產生與強勢論述相同的認同感及地方感。在「斯士安康」影集中，贊成設立掩埋場開發案的意見被塑造為「他者」，以襯托出反對意見的正確論述，並透過言說選取與影像編輯，強化安坑為充滿山林及自然棲地的地方圖像，賦予閱聽人對安坑的認同感及地方感。

(一) 建構強烈對比的「他者」

檢視「斯士安康」影集後可發現，環境正義是影集中的核心論述，節目中不斷地凸顯出生態中心主義概念，並積極塑造當地居民遭受環境不公的弱勢圖像，為了更加強化環境正義論述的正確性及有力性，記者再透過消息來源的選取與配置以及鏡頭影像的編輯與運用，進而建構出「斯士安康」中強烈對比的「我群」與「他者」。在影集中，最多的消息來源是當地居民，且是以反對設置掩埋場的意

見為主，發言時間長達 1,022 秒，佔總發言時間的 71.6%，其次是政府官員(185 秒、13.0%)及開發廠商(116 秒、8.0%)，最後則是專家學者(105 秒、7.4%)。很明顯地可以看出，「斯士安康」影集主要是以反對掩埋場的安坑在地居民作為消息來源管道，他們的聲音與想法被大量地複製與強化，並成為影集中的主流意見。

蕭蘋等(2003)曾指出，地方媒介存在的主要因素，是為了回應民眾的語言與文化，並且應該接近一般公民的生活，然而在台灣報紙所呈現的地方圖像中，主要的行動者或發聲者都以官方、社會專業菁英和男性為主，並且偏重正式組織的結構，而忽視一般民眾，使地方新聞所呈現出的地方圖像未能反映地方民眾的需求。相對於蕭蘋等人(2003)的研究，「我們的島」以全國性媒體型態報導安坑掩埋場的地方議題中，卻讓在地民眾掌握最主要的發言權，使媒體所再現出來的地方圖像，偏向在地居民所希望的發展藍圖。「我們的島」在這集影像中一反一般新聞媒體採取威權官方說法，而以市井小民心聲為出發，鋪陳議題敘事，一方面除了符合公共電視創台的使命 - 「主動提供多元的公共領域，使民眾享有表達的自由與知的權利」(何玉婷，2000)，及「我們的島」製作宗旨 - 「反映草根民眾心聲」(蘇志宗，2001)外，另一方面也切合公共新聞學(civic journalism)的宗旨 - 透過在地民眾的發聲，讓社區利益共享的注意力再被喚起，使社區成為實質的存在，並且幫助社區居民深化他們的地方感(Schaffer, 2000)。

除了在發言的時間上當地居民掌握較多的權力外，記者更善用剪輯手法，將與當地居民持相反看法的政府官員及開發廠商的聲音與意見給隱晦不見，例如以下的影集陳述：

規劃技師：整個場區有 50 公頃左右，目前我們規劃的掩埋面積大概在 20 公頃左右。

居民：那你這樣陸陸續續一直把它毀掉的話，那你叫這一些人，比如說現在有一些有錢的人都在移民了，那沒錢的人怎麼辦？他要守住這個家園，所以他要據理力爭，他要把這片土地保留下來，因為土地不可能再增加了。

在上述開發廠商影像片段中，開發業者開始的言談主要是資料事實的描述，沒有任何立場的言論或觀點，然而緊接著在開發業者言談的片段後，記者剪輯了居民的批判意見，指責開發單位不顧環境生態及居民安危的言說，但開發廠商在影片中卻沒有任何時間可以反駁上述的指責。同樣的編輯手法又如下例影像：

開發業者：剛好碰到政府在獎勵，然後我們就試圖提出新店安坑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環境說明書，也經過台北縣環評委員會通過。

居民：這 50.4 公頃加上環邊道路一共 58.5 公頃的樹統統要砍掉，那我們是很害怕馬上會有土石流，像對面的山就有土石流，我們保證我們這邊的山也會有土石流，而且還是垃圾流、灰渣流。

雖然記者又給予開發廠商時間陳述其設立掩埋場的合法性，然而這段論述又被緊接著出現的民眾言論給推翻。在第三次出現的時序中，開發業者強調運用科技可兼顧經濟開發與環境保育，然而接下來記者又剪引民眾指控開發廠商是生態殺手的片段：

開發業者：現在的科技跟專業的技術，妥善規劃它，然後嚴格監督執行，我們會使環境保護跟生態保育並行不悖。

居民：這麼小一個地方有這樣子豐富的生態已經找不到了，他竟然還這樣子給它毀壞，如果說這種動物、植物、鳥類你把牠的棲息地給毀了，以後在全世界就看不到，是不是我們是殺手，讓牠在地球上絕滅。

這樣的一種正／反二元論述的交互出現，徒具形式，開發廠商在陳述資訊後，立即被居民駁斥，完全沒有為自己辯護的機會，也沒有雙方論述交相互動的情形，成為一種虛假的二元對立，其中地方居民反對掩埋場的主體感被突出，開發廠商在編輯運用下成為「他者」，而這樣的剪輯手法也出現在政府官員的畫面中。

在新聞客觀性原則下，記者在處理新聞時應是中立者的角色，在報導中對意見不同的兩方皆給予相同的說話空間和份量，記者本身不加以評判或有預設立場(單波，1999)。然而，媒體原被寄望成為公共論述的中介性質在現今似已淪喪，媒體不僅無法代言，更成為代而為之的現象，諸多事務在媒體的取鏡下成為不同的影像(郭志榮，1998)。在「斯士安康」影集中，由於該節目對「草根聲音」的重視，使得安坑的在地居民成為影集中的主體，他們不只掌握了大部分的發聲空間，他們的意見與看法更被塑造成影集中的主流論述，而官員及廠商的意見則成為「他者」，兩者形成強烈的對比。同樣的情況亦發生在德國的媒體報導中，Hörschelmann(1997)以社會文化地理學角度探討東西德差異時指出，電視報導或影集並未再現實際的真實性，反而是積極地建構及再建構東西德的階級差異，「他者」(東德)在這些再現過程中，只是為了讓「我群」(西德)更加地自我認同，由於害怕這樣的認同感逐漸流失，以致於更需要「他者」的再復活，創造如此鮮明相反的意象只為了證明「我群」的存在。「斯士安康」影集亦有異曲同工之妙，將贊同掩埋場開發案的意見塑造為「他者」，反而明顯地襯托出「我群」，使反對掩埋場開發案成為影集中的正確論述，沒有掩埋場的設置亦成為安坑地區理所當然的發展藍圖。

(二) 強化安坑的地方圖像

「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地方」在「斯士安康」影集中不斷地被形塑出來，而這也是「我們的島」所極欲彰顯的安坑地方圖像。如前述在蝴蝶園中牛伯伯介紹如何與竹節蟲親密互動，當地居民在公聽會中表達他們主動調查掩埋場附近有野生動物二十餘種，以及市井小民形象的青年娓娓道出他對居住地區美麗山林的情感依戀等，此外，居家窗外即是青翠的山林、清澈的泉水可以直接觸摸洗手、以及附近烘爐地的登山步道讓人舒展身心等，這些言說與動作在影像編輯處理下，持續地彰顯出在這裡人與自然是如此地親近，並強化安坑是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地方」，而這個安坑的地方圖像也不斷地被複製到閱聽人的腦海中。此外，從地理學人地關係傳統論之，地方感可視為廣泛的環境意義之一，代表一種更複雜的人類與環境互動的概念，反映出人類如何回應自然環境，更可作為環境影響評估指標(Kaltenborn, 1998)。在「斯士安康」影集中所形塑出來的媒體地方感，即是在彰顯當地居民與附近自然環境的和諧相處，而這種人地親密關係在既有的環評流程中卻被忽略，以致引起當地居民對環評結果的質疑與不滿。

由於掩埋場的開發案即將進行，「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地方」面臨嚴重挑戰，如同這段影像所述：

旁白：這棟大樓裡的某一戶是孫老師多年前買下來的，打算退休養老的地方，但是從今年五月開始，窗外的景象卻不再平靜。

因此，在「斯士安康」影集中，掩埋場的設置開發被視為會影響到這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地方」，原本可以頤養天年的安坑極有可能變成灰渣掩埋場，所以當地居民反對掩埋場的立論在影集中成為主流，並且給予合理化。透過環境正義的論述脈絡，「斯士安康」影集不只呈現出反對掩埋場開發案的基本理由外，更進一步塑造環境的迫切感與危機感，呈現這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地方」即將遭受破壞，並且不只是安坑而已，全台各地皆有可能，期能喚起社會大眾的關心與同理。就如同片尾的影像，在漫天飛舞的蝴蝶與天真無邪的小孩所建構成一幅人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美麗圖畫中，記者的旁白及字幕所言：

旁白：中央環保署制定掩埋場獎勵計劃，地方環保局依法配合辦理，開發商依法投資設廠，從上到下構成完美廢棄物處理計劃，全台灣第一個配套中獎的地方是安坑，下一個中獎的是哪裡？

字幕：未來在合法的程序下，暗坑山林會填滿灰渣。回顧過去，土壤污染的難題，至今，仍然未解

「斯士安康」的影像敘事結構，從一開始激烈的警民衝突，激發觀眾深入瞭解的興趣，再以貼近市井小民的敘事言說，逐漸勾勒出反對安坑一般事業廢棄物掩埋場開發案的理由，最後用牛伯伯蝴蝶園中飛舞的蝴蝶與在此中嬉戲的孩童為背景，並以「下一個中獎的是哪裡？」作為總結。記者把最後一幕用蝴蝶飛舞的影像來鋪陳，捨棄了居民抗爭、積極行動等充滿戲劇元素的畫面，將安坑地區置放於一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地方」的形象中，並配合旁白與字幕表達對掩埋場的憂慮與擔心，讓觀眾能更加認同節目所營造出的安坑地方圖像。

Bushman(1997)曾指出，不同的媒體可利用不同的打光技術、聲音收錄及鏡頭角度等，在相同的地點呈現出媒體所要的地方意象，創造出不同多樣的地方感，然而這個地點卻仍未改變、依舊如故。Galliano 及 Loeffler(1999)亦指出，在傳播科技發達的現代，閱聽人對一陌生地點所擁有的地方感，往往受到媒介所操控，像是電視、電影、圖像、藝術品及相片等，人們雖然沒有到過那個地方，卻可以透過先前在媒介中對該地的觸及，而產生經驗印象，不同的媒介所組成的地方感與人們實際到該地的感受將會有相當的差異。在這種思維下，地方感已經不只是從個人的實際生活經驗中發展出來，而是受制於大眾傳播媒體所傳達出來的圖像。在「斯士安康」影集中，當地居民對於安坑地區的看法(無掩埋場)凌駕於開發廠商及官方的論述之上，並佔主導地位，居民因為反對掩埋場所建構的安坑地方圖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地方)，透過記者剪輯與鏡頭操作的強化而再現給閱聽人，賦予閱聽人對安坑的地方想像，甚至進而產生認同及支持。Williams(1999)曾指出，一地的地方圖像會從該地互異團體的爭鬥中被創造出來，有些團體希望刻劃他們的權力於特定的地景上，而其它團體則是企圖加以阻止，而他們通常運用的方法就是發掘可以增進我群彼此認同的符碼，經由認同，地方意義於是產生。在安坑掩埋場的爭議中，當地居民以安坑應是「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地方」作為彼此認同的符碼，藉以抵抗掩埋場的進駐，使其一躍成為安坑的地方意義，而這樣的地方意義也在「斯士安康」影集中不斷重現。

另外，記者在媒體地方感的呈現過程中無疑地扮演關鍵角色，其主觀意識及偏見好惡會影響到他

對該地地方意象的生成，進而牽動媒體地方感的形塑。由於環境記者對環境保護的使命感常較其它面向的記者更高(許哲彥, 1988)，所以這種使命感主導了某些報導和評論，甚至促使他們介入和參與環保運動的發展，使得環境記者的角色不再只是環境運動的報導者，有些甚至是運動的鼓吹者兼活躍份子(蕭蘋, 1989)。因此，環保事件的報導常無法完全符合新聞的客觀性原則，「斯士安康」影集即是一例，報導中明顯地偏向反對掩埋場開發案，並把安坑地區形塑成「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的地方」的地方圖像，使得反對掩埋場開發案的意見獲得合理性與正當性。

結 論

公共電視「我們的島」是國內第一個標榜以「環境正義」及「土地關懷」為製作取向的新聞節目，從 1998 年底開播至今已超過六年。強烈的守護環境與批判色彩是該節目自詡的使命與予人之印象，在國內主流媒體普遍漠視環境議題的時局中，該節目的存在頗具意義，它不僅開闢了一個專屬於環境議題的公共論域，更發揮著大眾傳播的環境教育功能。

在「斯士安康」影集，可具體而微地發現「環境正義」及「土地關懷」的氛圍貫穿於節目之中。在「環境正義」方面，該節目透過生態中心主義的論述，以彰顯自然山林與生俱來的價值與權利，並呼應生物多樣性及永續發展等當前國際環保思潮，以凸顯人類與自然世界間的平等主義，此外，節目中積極塑造居民的弱勢圖像，以襯托出事業廢棄物風險分配的不當與不均，進而強化對於環境不公的控訴，直接回應契約主義中每個人都具有相同的權利與機會的主張。在「土地關懷」方面，該節目將環境正義作為影集中的強勢論述，並以生態中心主義及居民弱勢圖像作為敘事主軸，將贊成設立掩埋場開發案的意見塑造為「他者」，以襯托出反對意見的正確性及合理性，並透過消息來源的選取與配置以及鏡頭影像的編輯與運用，強化安坑的地方圖像，賦予閱聽人對安坑的認同，進而建構對安坑的土地關懷及地方感。

雖然「斯士安康」影集有效呈現「環境正義」及「土地關懷」宗旨，然而，一則好的環境新聞報導，除了要讓閱聽人瞭解議題之來龍去脈外，更應提供閱聽人完善的環境資訊，以有效發揮大眾傳媒的環境教育功能，過於激情的報導或訴求雖較易引起觀眾共鳴，但往往忽視掉理性的辯證討論。在「斯士安康」影集中，節目不斷地塑造安坑居民為弱勢、悲劇的角色形象，以激情控訴開發案之環境不公，雖可獲得閱聽人的同情與關注，但環境正義的爭論應不只是關於環境風險分配的公平性要求，更應該關注的是如何預防那些污染物被創造出來，然而在「斯士安康」的影像論述中，僅強調開發程序及政府 BOT 專案的瑕疵，並沒有給事件主角 - 「一般事業廢棄物」的產生及處理任何的討論，科學性的分析不足，這是比較可惜的地方。

其次，「斯士安康」影集中所呈現的安坑圖像其實是媒體本身所建構出來的，媒體的意識型態結合當地的草根力量，讓社區民眾掌握主要的媒體近用權，並且明顯地將贊成掩埋場開發案的政府官員及民間廠商給邊緣化，反對設立掩埋場的意見在影片中成為主流論述，居民的聲音與想法被大量地複製與強化，且在環境正義理論脈絡襯托下，反對掩埋場的意見獲得了合理性與正當性，安坑的地方圖像也被再次地提出及確認。閱聽人經由該影集產生的媒體地方感與對安坑圖像的認同，其實是依循著全球保育浪潮下對環境正義與永續發展觀念的認可，換言之，以經濟開發為唯一選擇的思想已不為國人所接受。然而，在後現代的思潮中，多元觀點的呈現仍是大眾傳媒應有的專業責任，應避免因為立

場及順應社會潮流而陷入「政治正確」的泥淖中。至於閱聽人則應對媒介訊息保持理性思考，媒體再現並非全等於實際真實。

最後，由於媒體的快速進步及深遠的影響力，地理學與媒體的互動關係將日益密切，而地理學界未來對媒體的發展也勢必要有所回應及參與。Hay 及 Israel(2001)即指出，地理學者必須積極發展「新聞製作地理學(newsmaking geography)」，讓地理與媒體緊密結合，透過媒體的傳播功能，使得地理知識能在大眾意象及討論過程中更為正確有效。為了地理的普及化及生活化，地理學界應積極探討媒體報導中的地理意義，並進一步與媒體結合，甚至是要教育媒體，讓未來的地理相關報導能被正確地建構與傳播。

謝 辭

感謝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系林元輝副教授、農委會林業試驗所劉一新副研究員、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譚鴻仁助理教授及匿名的審查委員們給予本文諸多建議及協助；感謝公視「我們的島」節目提供本文第一作者實習機會，實際參與並收集資料，僅在此一併致上最高謝意。

參考文獻

- 王俊秀(1999)：《全球變遷與變遷全球 - 環境社會學的視野》，巨流圖書。
- 林志明譯(2002)：《布赫迪厄論電視》，Bourdieu 著，麥田出版。
- 邱育慈(2002)：如何提升台灣環境科學報導之品質，《第十一屆中華民國傑出新聞人員研究獎 - 得獎人研習考察報告》，中華民國新聞評議會。
- 何玉婷(2000)：公共電視台的整合行銷傳播應用研究，《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傳播所碩士論文》。
- 倪炎元(1999)：批判論述分析與媒介研究之初探—兼論其在華文媒介上的應用，《傳播管理學刊》，1(1)：205-233。
- 紀駿傑(1996)：環境正義：環境社會學的規範性關懷，第一屆環境價值觀與環境教育學術研討會，71-91。
- 徐美苓、丁智音(2004)：小病微恙的真實再現 - 以「感冒」的新聞論述為例，《新聞學研究》，79：197-242。
- 許如婷(2000)：球鞋類廣告：西方現代化情境的神話解構，《廣告學研究》，14：53-93。
- 許哲彥(1988)：環保記者何需替天行道，《新聞鏡週刊》，12：43-45。
- 郭志榮(1998)：後現代的媒介論述，《輔仁大學大眾傳播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張錦華、劉容玫、孫嘉蕊、黎雅麗譯(2001)：《傳播符號學理論》，John Fisk 著，遠流圖書公司。
- 翁秀琪(1998)：批判語言學 在地權力觀和新聞文本分析：宋楚瑜辭官事件中李宋會的新聞分析，《新聞學研究》，57，91-125。
- 黃新生譯(1992)：《媒介分析方法》，Arthur Asa Berger 著，遠流圖書公司。
- 陳右果(2004)：台灣原住民族群的「他者」影像再現 - 以公共電視「原住民新聞雜誌為例」，《南華大學傳播管理所碩士論文》。

- 單波(1999)：重建新聞客觀性原理，《新聞學研究》，61：247-258。
- 鄭玉惠(2000)：集體行動與地域性的再建構 - 以美濃反水庫運動為例，《國立台灣師範大學地理所碩士論文》。
- 蔡文川(2004)：地方感：科際共同的語言與對臺灣的意義，《中國地理學會會刊》，34：43-64。
- 戴育賢(1994)：大眾媒體與真實建構 - 一次現象社會學的探討，《新聞學研究》，48：169-192。
- 蘇志宗(2001)：啊！會長大的島，《公視之友》，31：15。
- 蘇峰山(2004)：論述分析導論，《教育社會學通訊》，54：18-31。
- 蕭蘋(1989)：環保記者專業意理及其影響因素之研究，《國立政治大學新聞研究所碩士論文》。
- 蕭蘋、吳秀麗、郭峰淵(2003)：地方新聞中的地方圖像：台南地區報紙的內容分析，《中華傳播學刊》，3，161-193。
- 陳鴻仁、王俊隆(2005)：鄰避與風險社會：新店安坑掩埋場設置的個案分析，《地理研究》，42，105-125。
- Agyeman, J., Bob, E. (2004): "Just sustainability": the emerging discourse of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Britain?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70(2): 155-164.
- Bendix, J., Liebler, C.M. (1999): Place, distance, and environmental news: geographic variation in newspaper coverage of the spotted owl conflict,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89(4): 658-676.
- Bennett, M. (2004): Difference shades of green, *College Literature*, 31(3): 207-212.
- Bushman, J.K. (1997): Crafting a sense of place: media's use of the Bonneville, *Journal of Cultural Geography*, 17(1): 77-94.
- Crang, M. (1998): *Cultural geography*, New York, Routledge.
- Dawson, J.I. (2001): Latvia's Russian minority: balancing the imperatives of regional development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Political Geography*, 20: 787-815.
- Dobson, A. (1998): *Justice and the environment: conceptions of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and dimensions of social justi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Field, E.E. (1988): Qualitative content analysis of television news: systematic techniques, *Qualitative Sociology*, 11(3): 183-193.
- Fowler, R. (1991): *Language in the news- discourse and ideology in the press*, London, Routledge.
- Galliano, S.J. , Loeffler, G.M. (1999): *Place assessment: how people define ecosystems*, Oregon, U.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
- Giddens, A. (1990): *The consequences of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UK.
- Harvey, D. (1989):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Oxford, Blackwell, UK.
- Harvey, D. (1996): *Justice, nature & the geography of difference*, Oxford, Blackwell, UK.
- Hay, I. , Israel, M. (2001): Newsmaking geography: communicating geography through the media, *Applied Geography*, 21: 107-125.
- Hay, R. (1998): Sense of place in developmental context,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Psychology*, 18: 5-29.
- Holifield, R. (2004): Neoliberalism and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 agency: translating policy into managerial practice in hazardous waste remediation, *Geoforum*, 35: 285-297.
- Hörschelmann, K. (1997): Watching the east: constructions of “otherness” in TV representations of East Germany, *Applied Geography*, 17(4): 385-396.
- Jensen, K.B. , Jankowski, N.W. (1991):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 Johnston, R.J. (1991): *Geography and geographers: Anglo-American human geography since 1945*, New York, Chapman and Hall.
- Johnston, R.J., Gregory, D., Pratt, G. & Watt, M. (2003): *The dictionary of human geography*, Malden, Blackwell Publishing.
- Kaltenborn, B.P. (1998): Effects of sense of place on response to environmental impacts: a study among residents in Svalbard in the Norwegian high Arctic, *Applied Geography*, 18(2): 169-189.
- Kurtz, H.E. (2003): Scale frames and counter-scale frames: constructing the problem of environmental injustice, *Political Geography*, 22: 887-916.
- Liu, F. (2001): *Environmental justice analysis: theories, methods, and practice*, New York: CRC Press.
- Low, N. , Gleeson, B. (1998): *Justice, society and nature: an exploration of political ecology*, London: Routledge.
- McFarlane, T., Hay, I. (2003): The battle for Seattle: protest and popular geopolitics in the Australian newspaper, *Political Geography*, 22: 211-232.
- McManus, P.A. (2000): Beyond Kyoto? Media representation of an environmental issue, *Australian Geographical Studies*, 38(3): 306-319.
- Mechant, C. (1996): *Earthcare: women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 Routledge.
- Meyrowitz, J. (1985): *No sense of plac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Miller, G.T. (2002): *Living in the environment: principles, connections, and solutions*, Pacific Grove: Thomson Learning Inc.
- Moores, S. (1993): Television, geography and mobile privatiz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8: 365-379.
- Myers, G., Klak, T. & Koehl, T. (1996): The inscription of difference: news coverage of the conflicts in Rwanda and Bosnia, *Political Geography*, 15(1): 21-46.
- Pauly, J.J., Eckert, M. (2002): The myth of “the local” in American journalism,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79(2): 310-326.
- Prout, J. (1999): Coming to terms with environmental justice, *Corporate Environmental Strategy*, 6(4): 399-406.
- Rantanen, T. (2003): *The new sense of place in 19th-century new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25: 435-449.
- Schaffer, J. (2000): Civic journalism, *National Civic Review*, 89(3): 267-269.
- Stavis, D. (2000): *Whose ecological justice? Strategies*, 13(1): 63-76.
- Williams, R. (2003): *Television: technology and cultural form*, New York, Routledge.

Williams, R.W. (1999): Environmental justice in America and its politics of scale, *Political Geography*, 18: 49-73.

Van Dijk, T.A. (1988): *News as discourse*, Hillsdale, L. Erlbaum Associates.

Van Dijk, T.A. (1991): *Media contents: the interdisciplinary study of news as discourse, A handbook of qualitative methodologies for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 London, Routledge.

收稿日期：94年 6月 23 日

修正日期：95年 2月 13 日

接受日期：95年 3月 1 日